



2007年1月,国家颁布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》,标志着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启动。这一计划的宗旨为“保护为主,抢救第一,合理利用,加强管理。”在此背景下,2008年3月1日,国务院批准公布《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,共2392部。此后依次公布:2009年6月公布第二批珍贵古籍4478部,2010年6月公布第三批珍贵古籍2989部,2013年3月公布第四批珍贵古籍1516部,2016年3月公布第五批珍贵古籍899部,2020年公布第六批珍贵古籍752部,接下来还在继续列入新鉴定的版本。

陆续公布的“珍贵古籍名录”信息量很大,文化界多方解读,各抒己见,大体归纳出七个关注点:一是录入典籍冠以“珍贵”二字,颇有寓意,也是一项创新。二是公布每一批珍贵古籍的同时,还陆续公布“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”。第一批51个,第二批62个,第三批37个,第四批16个,第五批14个,第六批23个。三是设立“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”,启动修复保护计划,在全国各地设立传习所。四是分批出版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,第一批8册,第二批10册,第三批8册,第四批6册,第五批6册,第六批4册。同时被收录单位也在出版图录,如《第一批湖北省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《辽宁省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《天一阁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《江苏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等。五是出版《一至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两册,内容附录中的4个索引,即题名索引、著者索引、版本信息索引、收藏单位索引,都是很重要的阅读线索。六是组织出版“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”,选取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中的典籍,以“史话”的形式编撰成书。七是2025年4月,“中华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”开始试运行。

这样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,涉及的问题很多,本文仅列出两件事情,略说如下:先说其一,即在征集到的1万多种“珍贵古籍”书目中,以私藏的名义列入书名的有多少?略作统计,记录收藏者、书房名号、书目编号及书题如下:大连市梁炳华09692《譬喻之海》,上海市陈昌、苏州市陈光远06588《白雨斋词话十卷》、

为“珍贵典籍”写史

俞晓群

06589《词则四集二十四卷》,云南民族大学昂自明06777《阿诗玛》,凤仪书堂09919《附释音毛诗注疏二十卷》,09960《法苑珠林一百卷》,石家庄市赵俊杰07221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目录二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》,白河书斋08384《本草纲目五十二卷图二卷》,芷兰斋00969《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疏二卷》,02552《纂图互注尚书十三卷》,02557《附释音毛诗注疏二十卷》,02615《中庸章句或问不分卷》,02664《北史一百卷》,02761《唐书二百二十五卷》,02864《吕大著增注点校三刘东汉节书三十卷》,03583《元史二百十卷目录二卷》,03606《少微通鉴节要五十卷外纪四卷》《资治通鉴节要续编三十卷》,04310《经略录二卷》,04552《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》,04877《太平御览一千卷目录十五卷》,04880《太平御览一千卷目录十卷》,05028《楚骚五卷》《附录一卷》,05113《陶靖节集十卷》,05162《颜鲁公文集十五卷》,05452《唐贾休诗集一卷》,05456《忠愍公诗三卷》,05509《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》《年谱一卷》《附录五卷》,05689《梅溪先生廷试策一卷会议四卷文集二十卷后集二十九卷》《附录一卷》,05850《逊志斋集二十四卷》《附录一卷》,05868《敬轩薛先生文集二十四卷》,05916《鲍翁家藏集七十七卷补遗一卷》,06020《一斋居士诗续集九卷附词一卷拾遗一卷》,06219《文选六十卷》,06521《诗学禁脔一卷》,06528《苍崖先生金石例十卷》,拉萨市甲日巴·洛桑朗杰11219《萨迦·贡嘎坚赞等信函》,拉萨市曲杰桑布11208《四部医典》,贵州民族学院潘朝霖02375《九星诵读》,09804《通书八卷》,09833《六十甲子流年》,09834《八十银》,09835《把井学文书》,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局古籍办公室李玄宁06757《苏巨黎咏》,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王子国06758《算天罡》,绿督室07173《妙法莲华经七卷》,西藏自治区扎囊县阿扎乡日追12922《大智慧经》,12923《般若波罗蜜多经》,西藏自治区措美县日麦拉康12924《般若波罗蜜多十万颂》,12925《般若波罗蜜多二万颂》等等,还有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列入的许

多珍贵版本,已有专著《天一阁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》出版。

此时想到中国几千年,历朝历代,抑或组织收集、鉴定、整理典籍版本,一直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。比如300多年前《四库全书》编撰时,官方出面收集书目,大约有四个来源:一是政府固有藏书,二是公私进入到遗书,三是《永乐大典》中散见之书,四是临时编纂加入之书。在此四个来源的基础上,又可以分出七项本子:一是政府固有藏本,分为敕撰本、内府本,三四是公私进入到之书,分为各省采进本、私人献进本、通行本,六是由《永乐大典》中辑成之书,即称永乐大典本,七是临时编纂加入之书,亦称敕办本。此中各种版本都有故事,而“私人献进本”的故事最多最生动。有兴趣者,可参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《四库全书答问》,以及韦力《殊痕探踪》序。

再说其二,即由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产生的“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”,自2012年立项,拟定陆续出版百种,至今已近30种面世。此丛书立意很好,韩永进在序言中写道:“尽管我国存世的各种典籍堪称汗牛充栋,但为典籍写史的著作却少之又少,许多典籍所蕴含的历史故事鲜为人知。如果不能及时加以记录、整理,随着时代的变迁,它们难免将逐渐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,成为中华文明传承中的一大憾事。为此,2012年年底,国家图书馆启动了‘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’项目,旨在‘为书立史’‘为书修史’‘为书存史’。项目由‘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’支持立项,采取‘史话’形式,选择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中收录的蕴含着丰富历史故事的珍贵典籍,用通俗的语言讲述其在编纂、抄刻、流传、收藏过程中产生的引人入胜、启迪后人的故事。”媒体采访称,这套丛书的代表性作品包括《文苑英华》《永乐大典》《史记》《皇輿全览图》《水浒传》《太平广记》《玉台新咏》《敦煌遗珍》《西夏文珍贵典籍》《尔雅》《吕氏春秋》《诗经》《春秋左传》《太平御览》《兰亭序》《三国志演义》等典籍的专题史话。

以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为基础,启动这样一套丰富的“史话”,确实是一个很好

的创意。总结一下,一是选题限定在“名录”之中,知识范围清楚,针对性强,可以避免选择书目的盲目与宽泛。二是选题创意符合阅读的需要,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饱读诗书的人,都需要对古籍“原典”作一些深层的了解。三是选题个性鲜明,每本书都能够以版本知识作为共同的切入点,由此提升了整套丛书的可读性与存留价值。四是组织了一个优秀的作者团队。五是在丛书的编写中,注重版本研究的时代性,比如《〈太平御览〉史话》,直接谈到目前“珍贵版本”的存世情况,即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藏明周堂铜活字本《太平御览》,此书已被列入第二批“珍贵古籍”02497。《〈太平御览〉史话》中还谈到,目前市面上可以见到的《太平御览》版本,如中华书局4卷影印本,以及河北教育出版社标点排印本。六是目前丛书的一些版本已经在市面增值或脱销,如《〈金刚经〉史话》《〈永乐大典〉史话》等。

“史话”是一个很好的写作体裁,真正写好却不容易。尤其是这样一个大套丛书,要求每一位作者的写作,都能够符合丛书的编写宗旨,做到学术框架整齐划一,文字风格大体相类,文章表述多为读者考虑,更是难上加难的事情了,怎么办?首先要做好基础工作,建立完好的写作提纲,选择知识丰富、理解力强、文笔好的作者,避免从书宗旨模糊,带来写作者理解上的差异,导致丛书表面上题目划一,而某些书中的内容离题、跑题等现象的发生,这些都是此类丛书组织过程中的大忌。其次可以考虑引入一些新的理论框架与写作方法,比如在策划丛书编写体例时,参考“书籍史”等理论体系,增加一些新的历史学术视角。再如撰写此类文章,还有“答问式”的写作体裁也很值得推荐,这方面的名著有张之洞《书目答问》,任松如《四库全书答问》等,都是很好的写作范例。其实“中国珍贵典籍史话丛书”中,有些本子已经有了答问式的风格。此处仍以《〈太平御览〉史话》为例,在它的目录中,许多句式如:类书编纂有哪些因素?《太平御览》之前有哪些类书?《太平御览》初名是什么?《太平御览》编纂方法与体例有哪些?显然已经是“答问式”的笔法了。

读懂柯劭忞,从这部年谱开始

何 灿

困境。他广泛搜罗柯劭忞本人著述、家属资料、档案文牒、交游文集、友朋书札、报刊报道、拍卖文物等,计400余种。在此基础上,将材料按年编排,系以月日,构成从谱前、正谱、谱后到附录的完整结构。这种“长编”体例,看似只是资料的汇编,实则暗含深刻的学术理念:它以时间为经,以人事为纬,在看似客观的编排中,让谱主的生命轨迹自行呈现。

此书的独特价值,首先体现在它对“柯劭忞是谁”这一问题的回答方式上。与传统的传记书写不同,年谱长编无意建构一个连贯的叙事,也无意给出一个确定的评价。相反,它通过材料的并置,展现了柯劭忞生命中的多重面相:他是忠于清廷的遗臣,视新政为“洪水猛兽”;他也是为稻粱谋的家长,明言“俸禄不可少”的坦荡;他是严谨的学者,以三十年之力倾力撰著

《新元史》;他也是慈爱的长者,为子女升学就取而谋划操心。这些面相之间并非没有矛盾,但正是这些矛盾,构成了一个立体而真实的人物形象。

尤为可贵的是,崔建利对材料的处理并非简单地堆砌。在涉及罗振玉、王国维等人书札的系年问题上,他参合柯劭忞行迹,对前人整理成果提出商榷意见。在关于陈垣请柯劭忞为《二十史朔闰表》题签的传闻上,他检核不同刊本,发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捐赠本中确有柯氏题签,这为探讨两人关系提供了新证。这些细节的处理,体现的不仅是编纂者的功力,更是一种学术态度:年谱编纂不是被动的材料汇编,而是主动的史料考证。

《柯劭忞年谱长编》的更大价值,或许在于它以柯劭忞为视角,对近代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独特的展示。柯劭忞的一生,跨越晚清与民国,历经甲

午战争、戊戌变法、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。他是这些事件的亲历者,也是见证者。通过他的交游网络,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知识人的生存状态:他与吴汝纶的翁婿关系,与王国维、罗振玉的学术往还,与日本学者的跨国交流。这些关系网络,构成了理解近代学术史、政治史的重要线索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书在体例上的创新。崔建利注意到,传统年谱长编以农历月日事,读者为确定某月某日之具体年份,不得不前翻后检,“倍感支离”。为此,他在农历月日后括注公历时间,且年、月、日俱全。这一改动看似细微,实则体现了编纂者对读者阅读体验的体贴。在数字化时代,学术著作的编纂理念需要更新,而崔建利的尝试,为年谱类著作的体例改进提供了有益借鉴。



动物文学,归心自然

李海卉

京郊的小院,阳光、草木与猫咪的身影交织,构成了最质朴的自然图景。王朔在新作《好猫八不》中一改辛辣文风,以温柔笔触记录与猫咪之间的相互救赎,实现了心灵与自然的温和相拥。动物文学始终是一扇通往本真的窗。英国自然写作者克洛伊·道尔顿的《野兔知道回家的路》告诉我们,自然不在遥远的荒野,它就在后院的门边,它需要我们放下身段,以谦卑的姿态等待它点头。两本书分别从野兔的野性与家猫的驯驯为载体,剖开了动物世界的纯粹信任、人与生灵之间跨越物种的深情纽带,更搭建起人类心灵与广袤自然重逢的桥梁。

在《好猫八不》中,与自然的连接是日常的、充满烟火气的。王朔笔下的八不,是一只人工繁育的美短猫,它生来便与人类相伴,有着猫咪独有的敏感与傲娇。王朔曾是笔锋凌厉的文坛顽童,对养猫一事最初满心抗拒,可当八不闯入他的(书中化身“丙”)的独居生活,一切都悄然改变。八不打破花瓶,他轻声包容“没事儿,不赖你”;八不黏人撒娇,他放下身段悉心照料。当八不踩在丙身上时,朋友说:“它把你当妈了。”在那一刻,坚硬了一辈子的灵魂被悄然融化。八不病痛衰老,丙日夜陪伴守至最后一刻。在日复一日的照料中,看着一个生命从幼小到衰老,全程参与,无法自拔。那是一种“你的一辈子就是我的十几年”的托付。书中那只叫多多的猫去世时,王朔写得极其克制却又摧人心肝:“丙把她放回,在她僵之前把爪收回,抚顺,抚在身体两侧。”王朔在书中提出了“收留”与“被收留”的辩证关系。表面上是丙给八不提供了一个屋檐,给它铲屎、喂食、治病;但实际上,是八不“收留”了丙。是八不的存在,让丙的独居生活有了牵挂,让虚无的时间有了刻度,治愈了他中年的焦虑与暮年的恐惧。

信任,是人与动物建立联结的基石。《野兔知道回家的路》中,克洛伊·道尔顿与小野兔的相遇,始于一场充满挣扎的救助,更始于一场打破本能的信任博弈。这只从荒野中走失的幼兔,天生带着刻在基因里的警惕——野兔不同于家兔,千百年的自然选择让它们学会隐匿与奔逃,人类的气息对它们而言本是致命的危险。道尔顿最初的干预,满是忐忑:怕沾染的人类气息让兔妈妈弃它而去,怕过度的照料磨灭它的野性,更怕这份善意最终变成伤害。但野兔终究放下了戒备,在道尔顿的乡间小屋中寻得片刻安宁,甚至在长大之后,依然会在夜色中离去、晨光中归来。这种信任,是野生动物对人类最奢侈的馈赠,它无关驯化,无关索取,只是基于生命与生命之间朴素的善意回应。道尔顿始终坚守“克制的干预”,不命名、不圈养、不强行占有,她放下掌控欲,才换来了野兔毫无保留的托付——甚至在诞下幼崽时,将书角角落当作安全的产房,见证生命的延续。“世界破破烂烂,小猫缝缝补补。”《好猫八不》中的信任,是驯化岁月里沉淀的温柔相依。《野兔知道回家的路》中的友谊,是一场打破边界的灵魂相遇。两本书揭示了人类心灵与自然的深度连接。人类从未脱离自然,动物便是我们回归自然的桥梁。

荐书

探秘传统文化



《诗酒精神》
商务印书馆

本书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涉酒诗词作为研究对象,探讨中国古典的诗酒精神。诗酒精神是以诗歌艺术的形式,借饮酒之事来表达对宇宙人生、性与天道的认识,实现“艺”与“道”的结合。诗酒文化探究,是思想史泛文化书写的一种表现,在一定意义上,或可拓展中国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进路。



《山河故土:昌州文脉五百年》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昌州于唐乾元二年(759年)置州,历史悠久,底蕴深厚。作者追溯一座西南边陲小城的“踪迹史”。将昌州500多年的置州沿革、政治经济、宗教礼仪、社会环境、文化生态、稗官野史、山河草木等作出梳理,为读者凿开一扇探秘地理人文历史的窄门。



《默化》
上海人民出版社

法国著名汉学家朱利安从哲学和语言两个角度对“默化”进行了深刻分析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“默化”强调在日常生活中无声无息、持续渐进的变化,如身体的老化、山体的风化、季节的转变。朱利安创造性地实现了这一概念的古为今用,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探寻提供了参考范例。

《张三李四》中的野性思维与人间底色

孟 虹

“所谓张三李四,无非芸芸众生,无非人间过客。”韩少功在新作《张三李四》的扉页上写下的这句话,既是一种自谦,也是一种宣言。这部于2026年1月出版的小人物短篇集,以举重若轻的笔触,讲述了48个游离于世俗规则之外的奇人怪事。在中国文学的星空中,“张三李四”从来不是一个具体的所指,而是对所有无名者的统称——他们是路人甲,是群众乙,是历史中那些“隐名的根基和底色”。

自“寻根文学”以来,韩少功一直致力于在乡土中国的褶皱里打捞被遮蔽的文化记忆。如果说《爸爸》中的丙崽是一个文化寓言式的象征,《马桥词典》是对方言背后思维方式的词条式解剖,那么《张三李四》则是一场更为轻盈也更为透彻的回归。这部作品集最大的独特性在于:它以“人物”为“小说的硬道理和净收入”,在荒诞与幽默之间,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民间“野性思维”的密门。

《张三李四》中的人物,大多带着鲜明的“怪异感”。他们是能通神的流浪汉、会法术的高人、备受尊敬的乞丐、跟狗一起

喝酒的铁匠、被毒蛇咬后反将毒蛇毒死的“毒人”。乍看之下,这是一部民间奇人的“浮世绘”,但若仅止于此,则低估了韩少功的野心。

书中的“奇”并非异类,而是普遍人性的“极端显形”。正如韩少功在自序中所言,这些“小人物”却也是可能被世人熟视无睹的一个个“伟大生命”。这种对“伟大生命”的发现,构成了全书深沉的人道主义底色。

法国人类学家列维-布留尔曾提出“原始思维”的概念,列维-施特劳斯则将其发展为“野性思维”——一种未被驯化的、具象的、具体的思维形态。韩少功笔下的张三李四们,正是这种“野性思维”的文学载体。

《毒人》中那位被毒蛇咬后反将毒蛇毒死的奇人,其身体内自成一体的生态循环,是对现代医学逻辑的彻底解构。《酒鬼》里那只模仿人类却又无法理解人类重复劳动的猴子,成了一面“动物哈哈镜”,照出人类许多社会行为的荒诞与无意义。这些人物之所以“奇”,不是因为他们

拥有超自然的力量,而是因为他们活在另一种逻辑里——一种与工具理性、效率至上、规训秩序格格不入的“野性逻辑”。

韩少功的语言风格与此高度匹配,他“轻松幽默的笔触”以及“白描”手法的运用,形成一种语言策略。这不是单纯的风格选择,而是认识论的必然:只有用近乎笨拙的白描,才能最大限度地贴近对象的本来面目;只有用黑色幽默,才能在荒诞中发现背后的真实。王蒙评价韩少功“亦叙亦思,有描绘有分解”,在这部集子中,“叙”与“思”达到了新的平衡——思想不再外在于故事,而是直接凝结在人物的血肉之中。

要理解《张三李四》的价值,必须将其置于韩少功40余年的创作谱系中加以考察。从《西望茅草地》到《爸爸》,从《马桥词典》到《山南水北》,韩少功始终在追问一个问题:什么是我们得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?如果我们上世纪80年代的“寻根文学”是在历史纵深中寻找文化的源头,那么晚近的韩少功,则更多地当下现实中寻找人的具体形态。